

从存在主义伦理观看《一九八四》的“虚化”思想

王永全

(河南工程学院外语系 河南 郑州 450007)

【内容摘要】存在主义伦理的兴起与极权主义具有一定的关联,以自由感知为基础,包括社会责任、自由、人道和诚实等。小说《一九八四》的双重思想作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违背存在主义伦理,具有欺骗性、荒谬性和“虚化”性。文章探讨了存在主义伦理的基本观点和小说中双重思想的本质,分析了双重思想对存在主义伦理的消解及其与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作者对极权主义的悲观情绪和对公正社会主义的信念。

【关键词】《一九八四》 双重思想 “虚化” 存在主义伦理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4-0173-03

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R·弗林教授把存在主义分为五大论题:存在先于本质、时间具有本质、人道主义、自由和责任、伦理考量至高无上^{[1](P154-155)},其核心是有关自由、责任、本真的伦理观。存在主义伦理观是对人的存在的尊重,是人道主义的选择。存在主义伦理观的各个要素相互渗透,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生存,从个体的丧失到个体的回归,从宗教领域的生存到政治介入,人的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一直是存在主义思想家追求的终极价值。存在主义理论家萨特、加缪和马塞尔等人要么因为亲身参加过世界大战,要么因为反对纳粹党的暴政,主张把伦理和政治相结合,强调人和社会团体的责任,反对极权主义双重思想对伦理的剥夺。在政治预言小说《一九八四》中,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描述了极权主义双重思想的特点:以剥夺公众自由为前提,以欺骗和“虚化”人的经验为手段,以实现极权统治为目的。小说叙述了双重思想引发存在主义危机,预示了道德价值观的丧失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崩溃。奥威尔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2](P8)}小说体现了双重思想的荒诞性以及存在主义伦理的破坏,揭示了作者对公正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了读者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

一、小说《一九八四》的双重思想与存在主义伦理的根本区别在于“虚化”人的感知

存在主义伦理的基础是对世界的感知,如果感知遭到束缚和抹杀,人的自由、社会责任等伦理将沦为虚无。人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和真诚地与他人相处不断地感知未知世界,实现主客合一,从而达到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目的。如果没有意识活动,自我就不能与他者进行主体间性的互动,自身也就不会存在。相反,没有感知经验,没有社会交

往和实践,意识也就失去本身的价值。

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英社党(英国社会主义党)篡改文字、记录、报告等,其后果令公众对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科学进步等丧失记忆和基本的经验能力,完全违背了存在主义伦理的宗旨。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认为,抽象精神会在受贬抑和异化的大众中引发政治的狂热,因为大众对自身价值和他人感到陌生^{[3](P247)}。在小说中,公众的意识被完全“汽化”,认为英社党的老大哥的每一句教导都是至理名言,老大哥就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他们对老大哥事事必洗耳恭听,然而,老大哥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党的创始人。公众盲目地认为,一切飞机、火车、火箭等现代发明都产生于党的领导,一切非正义的对外战争皆是正义的。英社党核心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完全的思想控制把平民变成无知的完全依赖党的乞丐,把几乎等同于无产者的外围党员变成无知的狂热分子。英社党党首奥勃良威胁外围党员温斯顿说:“以前的专制暴政的告诫是‘你干不得’。集权主义的告诫是‘你得干’。我们则是‘你得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反对我们。每个人都洗得一千二净。”^{[3](P232)}他们对核心党惟有恭顺是从,对英社党盲目地爱戴、尊重和畏惧,对一切社会事实麻木无知。少年侦察队因为年少缺乏经验更容易被党的正统思想的教化,对一切人包括父母严密监视,完全丧失了亲情和同志情谊,成为受党严密控制的“机械人”。外围党员之间不能存在任何友情和爱情,就连基本的男女之间的性欲也受到残暴的禁止。当温斯顿和裘莉亚进行地下爱情时,他们被思想特务发现并遭到逮捕。公众没有正常的现实中的生活,每天都生活在党的权威之中,无时无刻不蒙上监视和恐吓的阴影。核心党完全把意识和人的感知分离开来,完全剥夺他人的现实经验和真切感受。意识来源于感知和实践,然而感知能力的丧

* 作者简介:王永全(1968—),男,河南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失只能使人们被动地盲目地听从党的指令。双重思想的主要对象是统治集团内部除了执政者以外的人而不是民众,因为对于民众而言,最基本的常识早已遭到清洗。小说中所有的人已经失去现实中的自由感和责任感,不可能再找回现实的自我。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是由他人决定的,因此,核心党终会因扼杀他人的存在而令自己孤立并失去存在的价值。

二、双重思想的欺骗性以及诚实的虚无

存在主义哲学家托马斯·R·弗林教授认为存在主义伦理的首要问题是本真性,而本真性的关键在于自由和诚实。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反对纳粹党,也就是德国国民社会党,借鉴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存在主义观,推崇诚实、承诺和本真真理。如果丧失本真性,人们就会生活在“不诚”之中,就会丧失根本的伦理价值观。萨特说,非本真的人生生活在谎言之中^{[1](P211)}。首先,在小说中,双重思想变成了党的基本价值观,核心是反自由,手段是欺骗和奴役。党的基本口号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一方面,核心党假装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另一方面,它对其肆意地颠覆。小说中几乎是由核心党虚构的果而施坦因在反对党的极权统治的册子《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写道:

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现实估计在内——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3](P192)}。

英社党党首奥勃良蛮横地谎称一切过去和现实的世界完全产生于核心党的意识,把“二加二等于五”和“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等谬论强加于人。英社党捏造的党的敌人果尔施坦因说:

社会主义运动原来所主张的一切原则,党无不加以反对和攻击,但又假社会主义之名,这么做,党教导大家要轻视工人阶级,这是过去好几百年没有先例的,但是又要党员穿着一度是体力工人才穿的制服,所以选定这种服装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党有计划地破除家庭关系,但是给党的领导人所起的称呼又是直接打动家庭感情的称呼。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称,也说明有意歪曲事实之后颜无耻到了什么程度。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友爱部负责拷打,富裕部负责挨饿。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而是有意运用双重思想^{[3](P194)}。

一方面,党伪装成人民的朋友,给他们分配少量的生活资料,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活水平,以维持自己的特权统治。另一方面,英社党暗地里与民众为敌,把无产者当做性口,鼓励无产者妇女卖淫以供英社党核心党员享受,禁止公众喝杜松子酒。只要“强奸、抢劫、杀戮儿童、奴役人民、对战俘进行报复,甚至烧死活埋”,任何党员就能“为国尽忠,为民立功”。英社党所谓的文明就是战争、消费品短缺和炸死无辜平民。英社党把有限的技术进步全用于战争和间谍活动,因此大洋国“比五十年前还落后”。英社党之所以

这么做是因为惧怕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保障后由于觉醒而推翻英社党本身的统治。双重思想是荒谬的,英社党是荒谬的,无产者沦为无知,整个极权主义世界已经丧失了它的真实面目。

三、双重思想对人的责任的“虚化”

存在主义伦理与极权主义的双重思想具有历史上的渊源联系,“如果说存在主义和极权主义是同时兴起的并且贯穿二战和持续至二战后的话,那么就难怪存在主义作家使用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后果的术语来解释自我。”^{[4](P157)}根据萨特的社会存在主义观点,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个体的自由与责任才能得到加强。1937-1939年间,作者乔治·奥威尔非常推崇社会主义观,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代表着将社会主义看作改善生机途径的广大民众”^{[5](P260)}。然而,他所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托派”)受到了来自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清洗,因此他反对变种的极权社会主义,反对双重思想,认为执政党必须遵守严格的道德基础。

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奥威尔笔下的英社党产生于社会主义运动,其最初宗旨是为广大民众谋福祉,目标是建立公正、平等和自由的社会,但是英社党和英国社会主义已经发生变异,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党利用矛盾的和颠倒黑白的双重思想,表面上奉行社会主义,暗地里却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党的实际政治目标是把广大民众变成无知的、百依百顺的奴隶,建立寡头政体和实现极权统治的目标。党的经济目标是在不危及自己极权统治的前提下拉大贫富差距,实现英社党对社会财富的实际占有,最终使民众大面积贫困化。党的军事目的实际不在于军事,而是利用子虚乌有的战事操纵定期举行的仇恨周活动,轻易把民众变成党的狂热追随者。在社会生活方面,党利用电幕、思想检测仪等科技手段和思想警察对广大民众实行全景式的监视,完全限制人的自由,而这是英社党实施双重思想的首要手段和必要前提。

作为奥威尔的原型,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是全知叙事者,他具有人道主义和具有英社党党员的责任感,但最终还是走向其反面。当温斯顿冒险在酒吧里向群众揭露党的欺骗性和变异性时,群众的反应是冷漠的,因为党的双重思想已经将他们的感知和判断力完全抽空。他暗地里坚持承担一个情侣的责任,通过写日记的形式抒发对双重思想的愤懑,但终没有逃过电幕的监视。思想警察以思想罪把他们逮捕后,温斯顿仍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党员的社会责任,试图与核心党据理力争。但是,他最终还是背叛了党的人道原则。他虽然经历了承担与推卸责任的多次较量,但还是以失败和死亡告终。他的死亡证明了他最初的预感,更证明了在双重思想的泥潭中人的社会责任必然沦为虚无的命运。

首先,温斯顿具有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他把写日记的时间“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改写为“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以此象征极权世界的荒谬性。他用意识流的手法写道:“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的脑后勺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脑后勺给你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3](P18)}。像在福克纳的《喧嚣

与骚动》和乔伊斯的《一个青年画家的肖像》中那样,意识流往往表达人的焦虑和在自由的意识中超越自我的向度。起初,他没有看到双重思想的危害,认为它可能是对的,但是,他又觉得它不符合常识,认为“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3](P72)}他还认为英社党消灭旧词的手段和“正统即无意识”的思想是反动的,因为这里的无意识实质上是无知的翻版。核心党对他实施严密的监视,若即若离,令温斯顿身陷囹圄,永远也无法挣脱极权统治者撒下的神秘大网。奥勃良是神秘而专横的党的领袖老大哥的替身,是党的口号和双重思想的代言人。奥勃良对他来说,既深藏又显露,既友好又敌意,既惻隐又阴险,既迫害又关心。但是,他把奥勃良始终看做朋友,始终看作崇拜的对象。在人与人相互孤立的环境中,像温斯顿那样的人必然会缺乏社会经验。一方面,温斯顿坚持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奥勃良必定对其实施秘密的反制。

另外,主人公温斯顿最终遭到双重思想的异化,丧失了存在主义伦理。第三部分叙述奥勃良使用肉刑和双重思想的双重伎俩对温斯顿实施刑讯逼供,结果将其屈打成招。诸如“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之类的反动口号,多次以悬念的形式重复,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党是真诚的,但实际却相反。温斯顿对双重思想的认识经历了无知、朦胧的认识、体验、动摇、否定、肯定、再次动摇、违心的肯定的多次循环。对女朋友裘莉娅和群众,他时而富有责任感时而丧失之,在逆境面前,他表现了承担责任与推卸责任的的双重性。在思想被“汽化”的过程中,温斯顿既自主又被动,既忠诚又背叛,终于从一个反对核心党的党员无意识地蜕变为一名核心党的爪牙,一个准备谋杀无辜、出卖祖国和腐化堕落的反动分子。他在不自由的境况中追求自由,在没有爱和友谊的环境中追求爱情和理解,在幻觉中追求现实,在谎言中寻求真理,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党的虚伪说教是导致温斯顿思想和人性变种的直接诱因。

四、结语

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存在”一词多次出现,突出了极权主义的双重思想,使其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但却是反人道、违背存在主义伦理的。英社党使用“理智”的说教不仅抹杀了他人的存在,而且使自己最终陷于孤立。极权主义双重思想“虚化”了人的感知、自由、诚实和社会责任。被统治者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面前视核心党为“上帝”,逐渐丧失改变自我与世界的一切能力和勇气。只有维护存在主义伦理,极权主义才能逐渐灭亡,社会主义才能胜利。

参考文献:

- [1] Flynn, Thomas R. Existent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 [2] 奥威尔·乔治. 奥威尔文集[M]. 董乐山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 [3] 奥威尔·乔治. 一九八四[M]. 董乐山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4] Earnshaw, Steven. Existential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 [5] 泰勒·D.J. 奥威尔传[M]. 吴远恒等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7.
- [6] Adams, Hazard. Leroy Searle.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M]. Third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7] Denise, White, Peterfreund. Great Tradition in Ethic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 [8] Descartes, René.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M]. 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9] Orwell, George. Nineteen Eighty-Four [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4.
- [10] 倪梁康.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